

人生由我創造¹ 書籍分享：《我的爸爸是福伯》



香港教師戲劇會創辦人
江葉秀娟女士

「我人生很多階段都面對差不多要放棄，但我選擇了堅持爭取。」今年七十六歲的我，走過了一條充滿波折的路，每次跌倒，都以不屈的意志重新站起。

在貪污年代成長

我生於 1950 年，是典型的五十年代香港女孩。在那個年代，女孩能夠完成小學已屬難得；若小學升中試不合格，旁人大概只會說：「工廠多的是位置。」

父親卻沒有放棄我，堅持送我就讀私立學校。父親每月薪酬約二百元，私校學費卻需三四十元一個月，比例著實不輕。然而那是一個黑白灰道混雜的年代，父親從中獲得不少外快，方能負擔我的學費。

那是怎樣的一個年代？四大探長之一的呂樂，我自小便認識；六歲那年，他曾給過我一百元，可想而知此人有多富有。香港殯儀館創辦人蕭明，我亦相識。1972 年，我哥哥舉行婚宴，兩圍席間坐滿了法醫、醫生、警察、探長、黑社會頭目、棺材舖老闆，蕭明亦在場，更不乏販毒份子。父親在旁逐一介紹，叫我一一稱呼「阿叔」「阿伯」，毫不迴避。那便是我成長的年代——一個貪污橫行、五方雜處的香港。

讀書路上的重重挫折

讀了一年私校後，筲箕灣工業中學落成，我懵懵懂懂地考進去繼續升學。中學會考時，英文科不合格。眼見不少同窗就此投身銀行業，許多同學後來都以銀行經理身份退休，但我不甘就此罷休，轉讀新法書院，以為只需應考英國普通教育文憑（GCE），無需重讀中五，哪知實際上等同重讀。我也不在意，再考一次，終於合格，繼而修讀香港中文大學入學試課程。

放榜成績理想，地理科考獲 A 級，英文亦得 C 級，自以為入讀大學已是指日可待。豈料命運作弄——當年制度規定考生在放榜前先填報志願。我一心想讀社會工作，幫助貧苦大眾，便填報了社工系。地理系見我地理成績優異，邀請我出席面試，我卻在席間直言心儀社工，對眼前的地理系隻字不提，結果自然落選；社工系亦不取錄我。

¹ 本文為江葉秀娟女士於 2026 年 3 月 14 日香港教師戲劇會每月戲劇及創意教學策略工作坊的口述內容，再由本會教師培訓總監錢德順博士及教育主任區曉琪女士整理。

父親提議讓我報考香港大學，就在此時，他卻突患中風，幸而情況尚算輕微。面對母親的淚水，我不忍再增添家人的負擔；父親亦曾表示可以送我赴英升學，然而在會考前我患上腎結核（TB kidney），接受手術切除了一個腎臟，既無法從事護理工作，身體亦未必經得起遠赴異鄉之苦——幸而父親認識瑪麗醫院院長。那位院長，正是自幼看著我長大的殮房舊識——他察覺我偶發低燒，神情有異，當機立斷要我驗尿。化驗結果顯示小便中帶有結核菌，他隨即安排入院。彼時一個腎臟已然喪失功能，幸而發現尚算及時；加上他已出任瑪麗醫院院長，手術得以在最妥善的照料下進行，手術進行得十分順利，我卻自此成了醫科生的觀察對象。父親的職業，竟以如此意想不到的方式，守護了我的性命。在等待前路明朗的日子裡，我修讀了會計及打字課程，雖然入行不難，卻發現自己實在厭惡計算，心中始終另有盤算。

及至報考羅富國師範學院，依然波折重重。眼見同學一一收到錄取通知書，我連續數日音訊全無，心情由最高點跌至谷底，幾乎以為連這條路也斷絕了。正當我幾近絕望之際，奇蹟出現——父親一向待人和善，與負責派信的郵差相熟。一週後，那位郵差致電父親，說在遺失信件堆中發現了我的名字。原來信件上的地址有誤，被送往加路連山道，「查無此人」後退回郵局，郵差認出我的名字，隨即趕上門送達。

此時，距收生截止日期已過了整整一週。我即時乘車趕往羅富國師範學院，抵達時已是下午四時多，接近下班時分。學院本有充分理由拒絕我，因為我並未親自前往查榜；然而副校長尚未離去，傾談之後，竟決定取錄我。就此，我踏上了執起教鞭的道路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當年英文科不合格的我，入職後所教的，竟正是英文。為充實自己，我一方面得益於教會師友的指引補習，一方面廣泛閱讀：英文讀 C.S. Lewis，中文讀張曉風，藉文字磨練語感與文思。閱讀對我而言，從來不只是消遣，而是一種持續的自我塑造——這份習慣，伴隨了我一生。

從課室走向電視，再踏入教育署

在小學任教約八年後，我開始思量：若到了六十歲仍在教小學生，會否出現難以彌合的代溝？我不願隨年齡日長而失去對教學的熱情，於是主動求變。

當時香港教育署 (Education Department) 積極推廣「活動教學」(Activity Approach)。傳統課堂要求學生排排坐聽講，活動教學則改以小組形式進行，讓學生透過專題研習 (Project) 合作學習，不再囿於書本，與今日的創意教學理念一脈相承。我主動報名參與培訓，由此與教育署人員建立了深厚聯繫，更獲邀到其他學校分享教學經驗。其後我更成為第一屆教育電視 (ETV) 社會科教師，走上螢幕，將知識傳入千家萬戶。拍攝過程趣事連連：其中一集劇情需要吃叉燒炒蛋，我竟連續 NG 十二次，每次重拍都得再吃一次，令人哭笑不得。

任教第九年，教育署人員邀請我出任督學。面試當日，坐在席上的五位考官，我竟全部認識。由此可見，多年積累的人際關係，往往比一次臨場發揮更能發揮作用。說來坦白，我當時所持的是師範兩年制資歷，按規定本應三年制方具資格；然而正因人脈深厚，這扇門仍向我敞開。我順利獲聘，正式加入教育署，成為活動教學的督學，負責到校教授活動教學。

與戲劇有緣

我與戲劇的緣分，早在踏入教育署之前已悄然埋下，而那條引線，正是我的丈夫。他身為牧師，卻以大眾傳播科畢業，長年服務於「主良萬邦」——一個以廣播形式傳揚福音的機構。他熱愛話劇，回港後與一班同道組成劇社，排演台灣作家張曉風的古裝舞台劇，藉古典故事傳遞信仰訊息。其中《第三害》取材自「周處除三害」，以人自身的罪性為第三害，劇情簡單，道理卻深刻雋永。我本就

對舞台著迷，遂加入劇社，就此與他相識，後來更在香港大會堂正式公演，擔綱女主角一角。其後再演《和氏璧》，依舊是男女主角的搭配——他導演兼主演，我便是他戲裡戲外的拍檔。劇社紀律嚴明，遲到者一律取消當日排練資格，一人遲到，全組同受；能夠熬過這番嚴格要求的人並不多，然而正是這份嚴謹，磨練了我對戲劇一絲不苟的態度，也為我日後在教育署推動學校戲劇，奠下了最重要的根基。

籌辦香港學校戲劇節

未幾，遇上籌辦「香港學校戲劇節」的機會，我主動請纓，獲委負責視學處的相關工作。教育署又成功爭取到九龍樂善堂捐出五十萬元——以九十年代的幣值而言，實屬可觀。這筆資金用於資助學校參與香港學校戲劇節、聘請導師，並舉辦盛大的開幕及閉幕頒獎典禮。其間，我們更籌組成立了香港教師戲劇會，將學校戲劇推廣得有聲有色。香港學校戲劇節的理念，從來不止於演出本身。參賽學校須由學生全程撰寫排演日誌，記錄心得體會，最終連同演出成績一併評審；我們所在乎的，從來不是誰拿了獎，而是學生在整個過程中究竟學到了什麼。初賽完結後，成績優異的隊伍晉身決賽，移師西灣河進行多日角逐；壓軸的頒獎典禮上，優勝隊伍再度登台演出，為整個節目劃上圓滿的句號。擔任初賽評審的，很多都是劇界大師級人物，他們親赴學校觀賞演出，賽後更與學生面對面交流，以業界視野開拓年輕人對戲劇的理解。第一屆參賽學校已逾百間，規模之大，連負責到校評審的督學亦要分批出動，幾乎場場不缺席。在籌組香港教師戲劇會工作上，由於我熟悉戲劇界的很多朋友，便成為關鍵的籌辦者，教師們也認定我是香港教師戲劇會的創辦人。



創會人江葉秀娟女士（江太）於書籍分享會接受紀念座及獻花
香港教師戲劇會董事會主席司徒美儀博士（右）及會長黃麗萍博士（左）敬贈

制度的枷鎖

在教育署任職期間，我深切體會到制度對人一生的影響。當年督學職系分為兩個層級：大學畢業者獲委任為「大學畢業督學」（Graduate Inspector），非大學畢業者雖同樣稱為督學，職銜後卻附有「非大學畢業」（Non-graduate，NG）字樣。前者可晉升至高級督學、首席督學；後者的晉升路線卻由助理督學起，再進一級至督學，便是頂點。

說實話，這制度對我而言，實在是一種屈辱——在這樣的框架下，無論能力多強，始終無法晉升至最高一級。我深知自己的才幹絕不遜於大學畢業的同僚，卻因學歷問題而受到局限。這份不忿，化

作了往後求學的動力——移居紐西蘭後，我終於攻讀並取得教育碩士學位，以行動回應了多年積壓的不平。

移居紐西蘭，製作《獅子大王》兒童廣播劇

1997年，我決定放下一切，移居紐西蘭，重新開始。然而身處異鄉，我同樣沒有停下來——落腳異鄉後，我有幸在圖書館覓得一份工作，亦與一班年輕人組成劇社，在舞台上繼續發光。每逢有香港教師到當地交流，我亦主動協助接待。

當地有不少香港移民的子女，生活缺乏娛樂，既無合適的電視節目，又未有手機可用。我主動聯繫當地華語電台，為兒童製作了一系列廣播劇，每集約十分鐘，並設有聽眾電話互動環節，讓小朋友致電即席朗誦唐詩或表演樂器，廣受歡迎。播出時間恰好配合放學後乘車回家的時段，聽眾眾多。電台主持見節目深受好評，更協助出版書籍，教導兒童創作故事及練習發音。

廣播劇創作了一個以森林為背景的故事，當中「獅子大王」一角，由聲線獨特的丈夫客串配音。此後與丈夫在餐廳用膳，他一開口便被人認出，傳為美談。

其後，香港教師戲劇會把我的獅子王廣播劇出版成書²，還有中英對照。我在書的第一部份，講述了如何製作廣播劇的技巧，供讀者參考。



江葉秀娟（2016）。獅子大王兒童劇場：理論與創作。香港教師戲劇會

² 該書名為《獅子大王兒童劇場：理論與創作》，由江葉秀娟女士撰寫，於2015年由香港教師戲劇會出版。

選寫父親的故事《我爸爸是福伯》

在 COVID-19 期間，在家中閒來無事，便在媒體上一段一段的，分享我父親的事跡。友人閱覽後，鼓勵我把這些事跡出版成書，我便動手撰寫一本記述父親生平的書，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《我的爸爸是福伯》³。



葉秀娟（2026）。我的爸爸是福伯。太平書局。

父親起初入行擔任的不過是殮房聽差（Messenger）一職。哥哥出生時，父親向人填報職業，對方竟誤聽為「Manager」（經理），哥哥的出生證明上，父親職業一欄便堂而皇之印上了「經理」二字。這段小插曲，足見那個年代政府辦事之隨意，令人哭笑不得。此後父親轉任殮房解剖員，俗稱「割手」，專門協助法醫查明死者的死因。每當遺體送抵，父親便負責執刀開腹，法醫隨即取出內臟進行檢驗；若遇頭顱受傷的個案，他手法嫺熟，一刀便能俐落切開，讓法醫得以深入檢查。我自幼膽子大，常隨父親旁觀，親眼見證了他的精準技藝。

父親生性敏銳，洞察力過人：每每打開遺體，往往已有八九成把握推斷死因，令在旁的法醫頻頻點頭。當年醫學院設備簡陋，醫科生學習解剖學須親赴殮房實習，父親便盡心為他們逐一講解，從不藏私。其中一位醫科生，後來成為執業醫生，與父親結下深厚情誼。他起初在高立醫院任職，我們

³ 《我的爸爸是福伯》由太平書局出版，(太平書局為商務印書館旗下出版品牌)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發行，在各大書店均有發售。

有病便往那裡求診；其後晉升出任瑪麗醫院院長，我們看診，便可直達院長室。這段因殮房而生的緣分，意想不到地，日後救了我一命。

昔日著名女星林黛因吸入煤氣離世，身為忠實影迷的我，特意央求父親帶我前往瞻仰遺容。父親臨行前語重心長：「她是吸煤氣走的，死後面容最為完好；要輕生，千萬別學那些跳樓的，那可就難看了。」果不其然，遺容安詳，毋須施粉黛，依然姣好如昔。當日門外街道被記者圍得水洩不通，我差點回不了家。



江太小時候居於山道公眾殮房的職員宿舍

颱風「溫黛」肆虐那年，是那個年代威力最強的風災，全港無人不知。而在越戰連年的歲月裡，大批越南難民冒死渡海逃亡，不少人溺斃後，遺體漂浮於維多利亞港，有待運往殮房處理。父親身在其中，日復一日，習以為常；我雖自幼出入其間，卻不曾想到，這份外人難以承受的工作背後，竟隱藏著重重不為人知的人情世故。

父親的職業，在家中亦留下了印記。哥哥當年一度有意承繼父業，投身殮房工作；然而入行不足兩年，便打了退堂鼓——遺體日夜為伴，著實令人難以消受，嫂嫂亦無法接受丈夫每日歸家的那雙手。幸而政府體制尚有迴旋餘地，哥哥轉往瑪麗醫院擔任病房雜務，踏實做到退休，終究走出了屬於自己的另一條路。

父親除了是一名解剖員，更是個精於周旋的人。我自幼便奉他之命充當傳話人，不時致電「陸叔叔」，轉達一些令人費解的訊息：「三十二歲，穿著紅衫，長頭髮……」諸如此類。長大後才恍然大悟，那位「陸叔叔」原是《華僑日報》的記者。每當遺體運抵殮房，父親便暗中通報，讓報館搶先發稿，自然也換來一份生意——雖然他從未明言。

那個年代，貪污不過是稀鬆平常的生存之道。殮儀業者慣常在殮房門外守候，俗稱「行街」，每月按時向殮房員工繳費，以換取優先得知遺體送達的消息；一旦家屬趕至，業者便可搶先上前招攬生

意。類似的潛規則，彼時比比皆是一一消防員到場，先看看有無「打點」，才決定是否開喉救火；若無人孝敬，「散水」便是。這一切，對今日香港人而言或許難以置信，卻是那個年代真實存在的常態。

另一宗震驚各界的空難，更令父親終身難忘。七十年代越戰期間，一架國泰航空客機在越南上空爆炸，全機人員無一倖免。當時的法醫官王陽坤對父親倚重有加，堅持要他隨隊赴越協助驗屍。父親既無護照，亦無任何出入境文件，就此在毫無準備之下，登上了頭等艙——那是他此生唯一一次坐頭等艙，我至今亦未曾有此機緣。父親目不識丁，抵越後只能央人代筆，以明信片向家人報平安，卡上僅寫了兩個字：「平安」，此外再無別言。父親與法醫官在當地解剖遺體後，終於查明真相：爆炸並非戰火波及，而是一名乘客為騙取保險金，在機艙座位下藏放炸彈，無辜乘客因此盡皆罹難。父親事後每談及此，仍難忘那機身爆裂時的聲聲巨響，久久縈懷。

父親在殮房任職多年，見識過形形色色的奇案，其中一宗以紙盒藏屍的離奇事件，與跑馬地一帶有所關連，令人嘩然。

廉政公署（ICAC）於 1974 年成立後，警察獲得特赦，父親亦曾被「請去喝咖啡」接受盤問，幸而最終無事而回。父親心態坦然：「大家都是這樣做的。」況且警察既已獲免，又有何理由再追究一名殮房員工？隨著廉政公署雷厲風行，父親的外快日漸稀少，而我此時恰好完成師範課程，正式執起教鞭，每月薪酬約七百元，多少紓緩了家計。

然而，多年服務所留下的，遠不止於此。同僚與街坊都親切地喚父親一聲「福伯」——這個暱稱後來廣為流傳，至今殮房服務員仍沿用此稱。兢兢業業數十年，終獲政府肯定：1981 年，父親榮獲英女皇頒授大英帝國獎章（British Empire Medal, B.E.M.），頒授儀式由時任港督麥理浩爵士親自執行，對一名殮房服務員而言，實屬難得的殊榮。

(特訊) 福伯，一位為死人服務了三十四年的殮房管理員，沒有因殮房工作環境驚惡而產生厭惡感，反之工作表現良好，為上司所讚許，並於日前獲頒英女皇 B.E.M 勳章。

精神奕奕的福伯，其實已經六十歲，本已超過退休年齡，但由於上司對福伯的工作態度甚為滿意，故此福伯仍然留職，他說：「祇要精神好，仍然喜歡繼續工作。」

自一九四六年起便開始在公衆殮房當值，雖然最初工作時亦感胆怯，但工作習慣了却不當一回事，福伯認為「平生不作虧心事，半夜敲門也不驚」，他是一個完全不信鬼神之說的人，既然與死者全沒有關係，又何患有鬼怪騷擾。

殮房工作半生最近獲 B.E.M 勳章

葉福愛工作不言老 表現良好延遲退休

經驗豐富曾助偵破兇案

福伯每日工作八小時，三班輪更制，如果是當夜班就算半夜三、四點，若然有屍體運到，仍需起床收屍。他的工作不但負責收屍，當法官進行剖屍時，亦要在旁協助。

由於福伯已有三十多年的工作經驗，當收屍時或會與現場警察互相研究一番，藉此幫助找尋破綻。福伯憶記多年前，北角一家男子墮樓案，本沒有可疑之處，但經福伯在收屍時發現疑點，隨即轉告當場辦事警員，終破獲此乃妻子推丈夫落街的謀殺案。

福伯初時在已有約百年歷史的山道善公衆殮房工作，在一九七二年才搬到現時的域多利公衆殮房。殮房地方狹小，在文化大革命時期，沿海不斷深來浮屍，造成殮房爆棚情況。

福伯原名葉福，從一個殮房值差至附差（直接負責收屍及管理工作的）三十四工作中，一向熱忱於工作，不如電影形容殮房工作人員是冷漢陰魅，反之熱情健談，特別談及是次授勳，更喜形於色，在旁的福嫂亦不時為丈夫這份光榮而呈歡愉之色。

福伯說，當初我選擇這份工作，不外乎因學識普通，既無工作做亦無所謂，後來因上司、待遇、福利均不俗，推使他繼續工作了十年。

青年時候的福伯，是一個運動健將，是參加過醫務處球隊，現在年紀大便小活動，閒餘多看電視或偶然到馬場湊興。福伯有五子二女，均長大成人，並接受高等教育，是次授勳，不斷接到上司親朋祝賀，就訪問時亦有電話致賀。

福伯是次獲授的勳章，雖然不是一件貴重物件，但對一位普通公務員而言，却意義深厚，兼備鼓勵作用，福伯自言老懷安慰。

(梅)

1981年葉福先生獲英女皇頒授大英帝國獎章(B.E.M)

載於1981年4月18日《華僑日報》

其後，2003年有一齣本土電影以「福伯」為名，講述殮房服務員的工作；然而那是廖啟智的團隊自行創作的故事，既未諮詢父親，亦不曾與我商量，電影情節與父親的真實經歷並不相符。正因如此，我才決意親自執筆，寫下屬於父親的故事，讓真正的「福伯」，以他本來的面貌，留存於世。



父親葉福於 1978 年由時任港督麥理浩爵士頒授 B.E.M 勳章以示表揚

為平等而靜坐

入職之初，我便親身感受到男女教師薪酬有別的不公。義憤之下，我們聯合同僚，在羅富國師範學院發起靜坐抗議，整整一天不得開口說話——對我這個慣於侃侃而談的人，著實是莫大煎熬。我們所爭取的，不僅是男女同工同酬，更包括將中學教師納入政府公務員薪級表（Master Pay Scale）。當局有意將中學教師排除在外，若然不獲納入，政府體制內的教師可循序晉升，其餘則只能望洋興嘆。幸得眾人並肩，終於爭取到應有的待遇。而在我執教的第一年，學界更發起了罷課行動；也就是在這股抗爭浪潮之後，司徒華創立了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（教協），為全港教師搭建起一個歷久不衰的集體組織。

父親的晚年：從抑鬱到魔術

父親退休後，一度陷入抑鬱。有感於此，我深信人不應輕言退休——我自己退休已逾十年，至今仍繼續從事義工工作。

醫生建議父親尋找寄託，他便到老人中心參加活動，起初學唱粵曲，母親卻嫌嘈；後來機緣巧合，他觀看了一場魔術表演，深受觸動，決定自學魔術。父親四處購買道具，鑽研技藝，更積極到各大教會及老人中心演出，藉魔術傳揚福音，將歡笑帶給無數人。除此之外，他亦熱衷參與門球，屢獲獎項。友人更為他取了個綽號，叫「大衛高柏福」；他的義工精神廣受肯定，榮獲「十大傑出義工獎」。如此充實的晚年，他一直維持至八十多歲，直至眼睛因黃斑病變導致視力降低，才無奈放下。父親於九十三歲高齡辭世，走完了精彩的一生。

感謝父親，也寫給每一個人

我撰寫《我爸爸是福伯》這本書，是為了向讀者傳遞一個信念：人生並非只有一條死路。只要肯主動爭取，勇於為自己創造機會，便能走出另一種截然不同的人生。這，也是我藉著這本書，向父親獻上的深切謝意。

回顧自己的一生，上半場，父親是我前行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；下半場，則由丈夫接過這份守護，讓我以繼續在戲劇與各類活動中發光。我的生命裡，有兩位至關重要的男性，正是他們，成就了今日的我。我自知中文寫作功力一般，但許多讀者都告訴我：「感情大於一切。」我相信，書中那份對父親的深厚情誼，讀者必能感受得到。

希望大家喜歡《我爸爸是福伯》這本書，謝謝。



江葉秀娟女士於香港教師戲劇會每月工作坊分享書籍